

《水滸》講評

——評《水滸》資料之三

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图书馆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目 录

《水滸》讲评	(1)
1、《水滸》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1)
2、对近年来关于《水滸》的评论和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	(29)
3、当前开展对《水滸》的评论和讨论的重大意义.....	(38)
《水滸》中晁盖、李逵等人的言行	(43)
1、反贪官，反皇帝.....	(43)
2、反招安，反投降.....	(46)
胡适对《水滸》的一些看法	(50)

《水 滸》 讲 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滸》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滸》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阐明了评论《水滸》反修防修的重大政治意义。这一指示，是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开展对《水滸》的评论和讨论的指导思想。

现在，我们把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滸》的评论和讨论中的初步体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下面主要讲一讲为什么说《水滸》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同时也谈一下对近年来关于《水滸》的评论中的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以及当前开展对《水滸》的评论和讨论的重大意义。

一、《水滸》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水滸》是一部以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长篇小说。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我们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些分析。

(一)《水滸》完全歪曲了农民革命斗争，它的编写和流传适应了地主阶级消灭农民革命的政治需要。

《水滸》取材于北宋末年梁山泊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公元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直到1122年才最后失败。从南宋起，就已流传着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开始是口头传说，后来有记录下来作话本的片断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到元代出现了大段记载，也出现了有关的戏曲，到了元、明之交，才经过搜集整理编辑成为长篇小说《水滸》。一般认为施耐庵、罗贯中是编辑成书的作者。到明朝中叶嘉靖、万历年间，《水滸》开始广泛刊印流传开来。

《水滸》虽然取材是农民起义，但从内容看，它完全歪曲和否定了农民革命，竭力宣扬投降主义。

《水滸》是怎样歪曲和否定农民革命的呢？

首先，它抹煞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

毛主席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拿北宋来说，正是由于赵宋王朝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拚命掠夺，使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才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等多次农民起义。到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指使官僚杨戩、李彦等替他大量“括民田”，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又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在长江下游采集奇石异石等，用船运往京城玩赏。使农民和皇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起了南方的方腊和北方的梁山泊起义。方腊就明白讲过，他之所以要带领农民

造统治者的反，就是因为“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梁山泊农民起义，也是由于朝廷把梁山泊收为官有，勒令渔民缴纳苛捐杂税的结果。《水浒》对此却一字不提，反而对宋王朝极力美化和赞颂，说什么“至今徽宗皇帝，至圣至明”，“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大肆渲染宋江同贪官高俅的矛盾和斗争，妄图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来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

其次，它否定农民革命路线，鼓吹投降主义。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太平天国，“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这历次农民的革命战争，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王朝，坚持武装斗争，不畏强暴，浴血奋战。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表现了同阶级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创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就以方腊为例。他领导的农民革命于公元1120年（宋徽宗宣和二年）10月起义，坚持武装斗争，在两三个月内就席卷江南地区六州五十二县。方腊还提出“十年之间，终当混一”，即十年内推翻宋王朝、统一全国的主张，表达了起义农民砸碎封建国家机器的决心和信心。可是，《水浒》却抛开这千百次农民起义坚持战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不写，却偏偏塑造一个投降派典型宋江，把他作为全书的中心人物，洋洋细细地描写宋江的投降主义的全过程，即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乞求和接受招安，再到调转枪口镇压方腊农民革命。大肆宣扬投降主义，就是否定农民革命路线。

再次，它混淆投降和反投降的原则界限，百般丑化不愿意投降的革命派。

农民起义队伍内部投降和反投降的路线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在同这些投降派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反投降的农民革命英雄，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少的。例如，唐末黄巢，就公开反对王仙芝准备接受唐王朝招安的无耻叛卖行径，毅然和王仙芝决裂，率领起义军主力转战南北，取得了重大胜利。又如，南宋初年，在洞庭湖起义的杨么，多次坚决顶住投降妖风，英勇抗敌，被俘后慷慨就义。可是，《水浒》却对梁山起义军中不愿意投降的李逵、吴用、三阮等形象，贬低、歪曲、丑化；当作反衬，写成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宋江的错误领导，甚至有的最后被安排和投降派头子宋江同归于尽，葬在一起，挖空心思来混淆投降和反投降的原则界限。

由上可见，《水浒》歪曲农民革命，不论是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是否定农民革命路线，还是丑化革命派和反投降派，都是为了宣扬投降主义。

为什么《水浒》在当时如此卖力地宣扬投降主义？为什么宣扬投降主义的取材梁山农民起义的故事，戏曲、小说在当时又广为流传呢？这同南宋以至元明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宋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对女真贵族屈膝投降，对广大人民加紧迫害和压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到元朝末年（公元1351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残暴统治。明朝建立后，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晚期，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加剧，农民在土地被兼并和剥削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生活日趋艰难困苦，难以生存。“供税不足，则卖儿

鬻女”。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向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聚集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刘通、石龙等就于1465年（成化元年）首先在湖北房山举行起义，刘通称王，建国号汉，组织军政领导机构。到了稍后的正德年间，明武宗的暴虐政治和刘瑾的特务统治，加之各地豪门乡绅强占民田，加重剥削，“多取田租，倍增债息”，迫使农民又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这就是以河北文安人刘六（刘宠）刘七（刘宸）为首的霸州大暴动。开始于1510年（正德五年），自畿南达山东，以后一支部队过黄河，至皖北、河南等地，一直到豫南、皖西、鄂东地区；另一支则经山东、河北转战到鄂中，又沿江南下，一直到江苏长江下游地区。这次起义前后历时三年，活动范围广及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是明代中期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与此同时，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也有多处农民举行起义，其中还有少数民族的大暴动。

从宋代到元明时期，面对农民起义，统治集团除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和屠杀外，同时还采用政治上“招安”诱降的办法，用高官厚禄收买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从内部瓦解农民革命队伍。为此，南宋统治者还具体规定了对“并灭别火（伙）或本火（伙）盗贼了当，赴官出首，自表本心”的叛徒“正补官资，除授差遣”的“赏格”条例。当时，钟相、杨么起义军，就是被南宋统治者用大军围剿兼从起义军内部收买叛徒而镇压下去的。元末张士诚和方国珍也是在这种“招安”策略的勾引下，投降元朝，调转枪口，攻打红巾军。这种“招安”策略，曾使投降主义的逆流，在起义队伍中一度泛滥。

毛主席说：“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适应封建统治阶级使用“招安”诱降的反革命策略来消灭农民革命的需要，在南宋时就出现了以宣传农民革命的叛徒受招安并充当鹰犬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当时，有一个名叫邵青的，曾经聚众造反，后来接受招安，接着又卖力为统治者效劳。有人就将邵青的事编成小说，讲给宋高宗皇帝听，并且受到赞赏。这样，宋江受招安，又去打方腊的同类故事，便被封建文人大肆宣扬起来。鲁迅先生说得好：“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招安就是统治者的灭“盗”平乱之策。可见，宣扬招安的宋江的故事在南宋开始讲说，后来被编成长篇小说《水浒》，并广为刊印流传，都主要是因为它适合于自南宋以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很看重《水浒》，明代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等就曾刊印过。《水浒》编辑成书、广为流传的背景，以及官方刊印的事实，都说明《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水浒》宣扬投降主义，完全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为什么后来金圣叹又来了一个腰斩《水浒》呢？

金圣叹是生活在明代万历三十六年至清代顺治十八年间（即公元1608—1661年）的一个地主阶级的反动文人，在崇祯十四年左右，他伪称自己得到了早已失传的施耐庵的七十回《水浒》古本。实际上，他是把当时流行的一百回本《水浒》拦腰斩断，砍掉了七十回以后的宋江一伙受招安、征方腊等二十多回，并将原七十一回排座次以下的文字删去，加上一个卢俊义惊噩梦，在梦中看到梁山一百〇八个头领一个个

被嵇叔夜杀掉，作全书的结局。金圣叹这么一砍，就使人们认不清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如何在革命队伍内部得势，直到完全葬送梁山农民革命事业的全过程，也看不清投降派背叛革命、充当奴才的丑恶嘴脸。因此，砍掉了，不真实。

为什么金圣叹要腰斩《水浒》？鲁迅先生讲得很清楚：“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时的社会阶级斗争情况是怎样的呢？明末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两支起义军为主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使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当时起义军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明王朝的招安阴谋。崇祯年间，许多有名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熊文灿、兵部右侍郎陈奇瑜、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等，都因鼓吹招安失败，被明王朝杀头或流放。这一情势，对金圣叹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策略上，有着重要影响。他从明王朝招安政策的不断失败中，总结了反革命经验，激烈地反对招安，疯狂地鼓吹军事镇压，主张“斩尽杀绝”。这就是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所在。可见，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说明《水浒》不适合反动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只不过是金圣叹按照主剿派的观点给以加工，使它切合当时情况，更好地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罢了。

（二）《水浒》呕心沥血地塑造了一个投降派典型宋江，
通过美化和赞颂宋江来大肆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中的宋江到底是一个什么家伙呢？我们打算从三个方面来剥开他的画皮：

1、宋江的一生是反革命的一生。

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寨

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揭露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象一面明镜照出了宋江的原形。

宋江压根儿就和晁盖走的不是一条道。

梁中书从人民身上搜刮了十万贯金银珠宝，准备送上东京给他岳父蔡京庆生辰。晁盖们认为这是“不义之财”，便“智取”了。这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传到宋江的耳朵里，却使他“吃了一惊”，认为这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为了捞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的影响，便私放了晁盖。事情暴露之后，晁盖一把火烧掉自己的庄院，带着弟兄们同心协力地抗拒官军追捕，杀了官兵，伤了何涛，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果宋江要有一点革命性的话，就应该为晁盖们的壮举拍手叫好。恰恰相反，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坐卧不安，唯恐这件事要株连到自己，“惹出一场大事”。可见宋江放晁盖，决不是支持晁盖上山造反。《水浒》作者通过燕顺之口，把梁山的兴旺，说成“尽出”宋江“之赐”。这完全是为了美化宋江。

大概是吓掉了魂的缘故，宋江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手里，让她抓到“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的证据。宋江一时怒气杀了阎婆惜。在朱仝等人的周全之下，他得以逃脱。逃往哪里？他选了三个去处：一是贵族后裔柴进处，二是朝廷命官花荣处，三是地主孔太公庄上。唯独不上梁山。

打听到朝廷要征剿扫荡清风寨的消息后，宋江随着花荣往梁山泊避难，行至途中，接父亲“病故”的家书，宋江就

连夜奔丧回家。很清楚，宋江对梁山革命事业毫无兴趣。

在剃配江州的路上，他估计到梁山好汉要下山来抢他，交待押送公人“只拣小路里过去”。可是照样撞着了晁盖派来迎接宋江上山的刘唐等人。刘唐要把两个押送公人杀掉，好让他宋江上山。宋江连忙说，这是陷他于“不忠不孝之地”，甚至用自杀相威吓，再次拒绝上山。

被吴用以婉言搞上山去后，他仍然声称，如果入了伙，“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并且又是乞死，又是泪如雨下，又是拜倒在地。总之，“坚誓要往江州”服刑。

在寿阳楼上，他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乘着酒兴，填了一首《西江月》的词，并附上四句诗，表明他为了向“冲天大将军”黄巢对着干，立志走“顺天”的道路，实现他尽忠报国、青史留名的“凌云志”。

从宋江咒骂晁盖们造反，到宁可逃走在江湖上也不愿投靠梁山，再到情愿吃官司，拒绝进水泊，可以看出宋江是个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就是宋江其人上山前的表演。

闹了两座州城，“犯下大罪”，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但他混入革命队伍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不改，充当了地主阶级的忠实代理人。晁盖在世时，他一面假惺惺地发誓，“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一面积极进行篡权活动，妄图架空晁盖。每遇军事行动，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由，不让晁盖出马，使晁盖名为山寨之主，实际上指挥不了军队。而他利用捧帅的机会，既可大树自己的威信，又便于结党营私。他对被俘人员不是“亲解其缚”，就是“执杯陪告”，或者是“情愿让位”，其

用心是非常清楚的。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察觉，并进行了斗争。在打曾头市时，晁盖针对宋江的阻拦，说出的“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那一段话，不留情面地将宋江所称哥哥“不可轻动”的话顶了回去。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接班人的资格。由于晁是被“屏”的，所以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晁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斗争，显得比较单薄，没有多少群众基础，是不出奇怪的。总之，在这段时间里，他慑于晁盖的声望，阳奉阴违，活动比较隐蔽，像“替天行道”，“专等朝廷招安”这一类话一般只能背着晁盖说。

宋江见晁盖死了，虽然像“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但是泪水未干，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修正了晁的路线。从此梁山农民军开始向反面转化。接着，宋江通过改组领导，把卢俊义启请上山，重用朝廷降将等一系列活动，拼凑了接受招安的班底。

到了“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宋江认为时机成熟，就露骨地吹嘘自从晁盖死后，他宋江怎样得到“天佑”，使梁山泊面貌为之一新，公开地抛出“惟愿朝廷早降恩光”的乞降的纲领。更有甚者，为了把他的一套打算合法化，便在忠义堂上设坛求神。果然求得一块石碣天书，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天罡地煞，计一百零八员。于是宋江就号令起来，“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违了天言”。紧接着就在梁山之巅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并强令众人对天盟誓，一同“保国安民”。这里的“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王国，这里的“民”就是地主阶级，而不包括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时过不久，宋江又在赏菊宴会上起劲唱起“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滥调。于是接受招安的乌云便笼罩着梁山，尽管有几股反

招安的“旋风”不时在刮，也终究不能把乌云吹散。

急于要当奴才，宋江就匆匆忙忙，带着“金珠细软”赶往京师找门路，打通关节，乞求招安。宋江可耻地走和“今上”徽宗皇帝“打得火热”的妓女李师师的后门，送了李师师一百两“火炭似的”黄金，力图打通她“枕头上的关节”，以便“暗里取事”。见面之后，宋江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了李师师。这“衷曲”，就是招安，就是投降。不料李师师的一肚子怒气爆发，闹了乱子，打破了他的美梦。

但是宋江“一心只要招安”的心并不死。当他听到陈太尉奉旨到梁山来招安的消息后，顿时“大喜”起来，对众人说：“我每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把当奴才，说成是“成正果”，这就是叛徒的语言。又是李逵扯诏骂徽宗的壮举，吓得陈太尉等屁滚尿流地跑了。可是宋江这个奴才还担心主子不来招安，就给主子献策，要根据梁山泊里的“弯曲”，“以数句善言抚慰”，俨然是一副内奸的嘴脸。

但是宋江的奴颜并没有博得主子的青睐。招安不成，封建统治者就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派童贯率兵数万，进犯梁山。然而事与愿违，童贯收捕的结果是杀得他“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二停”。由于宋江“素怀归顺之心”，从来没有打算同朝廷势不两立，所以他“唯恐”众将要追童贯，以“收军回山寨请功”为借口，让童贯漏网。

一切反动派都是顽固派。捣乱失败了，还是要捣乱。高俅继童贯之后，又奉旨调十路节使并一路水军头领向梁山泊反扑过来。然而高俅的运气比童贯并不好些，他两次进攻都是惨败而回。进攻不行了，宋王朝又玩弄起招安的牧师把戏。



然而一切叛卖革命的人，“总是以个人开始，以罪恶告终”。宋江虽然“屡建”屠杀农民起义英雄的“大功”，还是难免“兔死狗烹”，被“御赐”鸩酒送终。可是宋江这个奴才仅剩下一口气了，还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并且怕“反心未除”的李逵在他死后还要啸聚山林，坏了他宋江“替天行道”忠义之名”，还亲手药死李逵。宋江对皇帝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而言之，宋江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搞投降，专反农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2、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引进死胡同。

晁盖在世时，尽管作者少写或者歪曲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是我们从书中的只言片语里，还能够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封建政权的。晁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李逵的主张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朱贵的态度是“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晁盖们坚持的是反皇帝，反封建政权的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梁山革命事业才蓬勃发展，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心向往之的根据地。

正是因为晁盖们把反皇帝的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所以宋江搞修正主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在在这方面进行“修正”，使之成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使“替天行道”的“法旨”得以实施。为此，他要把“至圣至明”的标签贴到皇帝的脸上，把自己年过三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刺文双颊，配在江州的“不幸”加到奸国的罪恶账上。一旦晁盖去世，自然他要迫不及待地把晁的聚义

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革命路线的象征。宋江将农民革命的“义”，“修正”为封建的“忠义”，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虑，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了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这样一改，就把农民革命纳入了地主阶级中“忠良”与“奸臣”斗争的轨道。

因此，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核心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就在于反对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不准农民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同时，由于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宋江同高球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不管他们之间的斗争有多么激烈，但在维护以皇帝为头目的整个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宋江打败童贯而不追，活捉高球而不杀，相反，方腊等农民革命英雄落到他手里，置于死地不为快，剖腹剜心才解恨。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贪官、皇帝都不反，专反农民。由此看来，所谓“替天行道”，拆穿来，就是替皇帝、替封建王朝行镇压农民革命之道。“终于是奴才。”鲁迅先生的这一结语，非常精当、深刻。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主义。宋江为了贯彻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拉拢私党，排斥革命派，要尽了花招。宋江未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前，为了报私仇，就不顾晁盖的劝阻，“自和众头领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脚板底下还未沾上梁山的泥土，竟指挥起梁山的军队来了。可见，宋江根本不是什么谦谦君子，而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混入梁山后，他处心积虑地架空晁盖，排斥晁盖，一只手抓住军